尹秋玲，夏柱智．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1）：92-99.
YIN Qiuling，XIA Zhuzhi. Model of family upbringing：an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rural young women's low fertility intention［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2，21（1）：92-99.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2.01.011

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

尹秋玲[1]，夏柱智[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2488；2.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这需从农民家庭抚育模式视角解释。在一些高度城镇化的农村，抚育模式从夫妻粗放式养育转变为婆媳精细化培优。农民家庭抚育主体从夫妻变为婆媳，抚育成本变高，方式更精细。在新型抚育模式下，个体压力和代际支持压力机制共同抑制了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个体压力机制表现为生育将带来核心家庭再生产压力大、女性职业发展困境、社会交往受阻与生理劳累，导致年轻媳妇不想生；代际支持压力机制表现为婆婆因抚育义务刚性化风险、自养财富积累受阻、老年夫妻感情生活牺牲以及家庭抚育地位边缘化而不愿带。这说明农民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有自己的行动逻辑，积极的生育政策应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系统完善生育、抚育、教育、养老等公共政策。

关键词：低生育意愿；家庭抚育模式；婆媳合作；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2）01-0092-08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2014年部分学者基于人口抽样数据以及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借助科学估算方法，预估出二胎政策开放将会形成一定的生育小浪潮，新生人口可能会达到4995万[1]。2016年1月1日二胎全面放开后，2016至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新增人口数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18年比2017年整整减少了200万，这说明人们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宏观统计数据呈现的结果恰与笔者近期在村庄调研中观察到的经验具有高度一致性。农村青年妇女作为家庭抚育责任主体不愿意生二胎，为何她们的生育意愿如此低？这便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

关于二胎的低生育意愿，学界主要是在人口学的视角下，以定量方法聚焦分析影响城市女性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其一是经济压力因素。较高的经济压力抑制了人们生育意愿[2-3]，经济压力通过收入和支出共同作用于二胎生育意愿，房价、教育开支抑制了二胎生育意愿[4]。城市妇女主要是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农村妇女主要是养不起[5]。其二是社会支持因素。家庭关系和谐程度以及代际之间的支持力度影响妇女的生育意愿。夫妻感情深的生育意愿较高，感情不好的生育意愿较低[3]，拥有公婆支持的妇女，照料上有人分担，生育意愿较高，反之则生育意愿低[6]。其三是妇女职业发展因素。职场性别歧视、生育对晋升的影响会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率[7]，但相比于自我职业发展追求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妇女就业单位的性质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有体制庇护的妇女明显比无体制庇护的妇女更愿意生二胎[8-9]。其四是文化因素。“重男轻女”“传宗接代”观念下，头胎是儿子的会减少家庭二胎生育意愿[10]；反之，如果头胎是女儿，则二胎的生育意愿较强[11]。但生男的传统偏好受家庭关系现代化程度影响[12]。另外，因儿

收稿日期：2021-07-04 **修回日期：**2021-08-07
作者简介：尹秋玲（1992-），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E-mail：17812543959@163.com

子养老作用下降，“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弱化，一份从人口学视角出发的定量研究在影响低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分析上较为全面，笔者很受启发，但不足之处在于缺乏从社会学家庭视角出发的深度机制分析，生育决策的基本单位是完整家庭，它受到家庭结构系统性变迁影响。由此，既有定量研究一方面没有理清生育观念从高到低的关键变迁变量，另一方面无法洞悉生育主体低生育意愿背后深层次的行动逻辑。另外，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分析城市女性，忽视了对农村女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农村青年妇女的低生育意愿需要从城镇化背景下家庭抚育模式视角进行解释。笔者于2019年在武汉蔡甸进行了为期20天的村治模式调研，围绕农民家庭的生育意愿，深度访谈了相关村庄计生工作者、育龄妇女和中老年人，深度的个案访谈是本研究的实证基础。

有基于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农民家庭抚育模式视角分析农村青年女性低生育意愿的抑制性压力机制。第二节重点分析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家庭抚育模式的转型。第三节分析新型抚育模式下，农村青年妇女的低生育意愿个体压力机制，主要从家庭再生产、个体职业发展、社会交往和生理劳苦三方面解释。第四节从抚育责任刚性化、养老财富积累、老年夫妻感情生活、抚育地位四方面阐释老年婆婆为何不愿带，作为代际支持压力机制同样抑制了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最后，文末是简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抚育模式的转型

（一）田野介绍：高度城镇化的大城市近郊村

H村属于典型的武汉城郊村，以H村所在的乡镇为例，共有17个行政村，1个社区，16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达191 019人，其中农业人口16 027人。该镇因为早在21世纪初在武汉的城市规划上被划为基本农田，被打造为“万亩产业园”，所以该地区产业以农业为主，农业用地如蔬菜、水果，占地约467公顷，苗木占地约400公顷，是武汉重要的农副产品的供给基地。同时，近些年政府着力以休闲旅游和康养为方向将H镇打造为“园艺小镇”，由此，该镇也是武汉市民的康养和周末休闲旅游的主要场所。在此背景下，H村共14个村民小组，15个自然湾，397户人家，总人口1294人，村中版图面积320公顷，可耕地120.53公顷，其中水田94.73公顷，旱地25.8公顷，村地面积122.67公顷，土地大部分被大户流转出去种植苗木。因靠近武汉，受大城市经济辐射作用，H村除少部分老板群体经营苗木外，大部分村民家庭生计很早便已经全部转为务工，年轻人多在武汉市区和附近的工业区打工，以武汉市为工作和生活场所，周末和假期会开车回到村庄中休闲。而中年人往往在苗木公司和城市绿化园艺公司打工，以农村为主要的生活场所。在武汉市的经济辐射和全务工型家庭生计模式下，当地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比普通型村庄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要高，以主干家庭4个劳动力来算，普通家庭年收入在15万～20万元，村庄中超过60％的人已经在武汉市买房，城镇化开始的时间较早，速度较快。由此，不论是从农民的家庭生计还是从村庄中年轻人的生活重心来看，H村已经高度城镇化。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家庭抚育模式转型

工业化和城镇化作为两股现代性的力量，推动了农民家庭发展目标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转变，以实现地位跃升和阶层流动[14]。而家庭抚育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的重要部分，受扩大化家庭再生产驱动，其模式也逐渐发生转变。费孝通认为围绕着整体社会运转，每个社会都构建了一套有特色的从生到养的制度安排，它不仅涉及两性缔结家庭的婚姻和建构关系的亲属规则，更涉及家庭内部在生养上的性别安排和代际分工策略[15]。受此启发，笔者将抚育模式暂定为家庭抚育在抚育主体、抚育成本和抚育方式上系统的特征综合。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抚育模式的变迁历程，如表1所示。

表1 农民家庭抚育模式变迁

	传统农业时期	打工留守时期	城镇化时期
分工	年轻夫妻	祖辈	婆媳合作
地点	农村	农村	城市
成本	较低	上升	高
期望	较低	低	高

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农民家庭抚育模式为夫妻粗放式养育，农民家庭结构完整，抚育主体以年轻夫妻为主。因为家庭人口较多，婆婆出于家

庭政治“公平”考虑，一般不会主动带孙，否则会引起婆媳矛盾和家庭纠纷，除非在农忙时期，年轻媳妇作为壮劳力需要参加抢种抢收，婆婆才会主动带孙。在传统家庭简单再生产的逻辑下，抚育目标是将小孩健康养大，帮助小孩结婚生子，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对教育阶层流动的期望不高。打工留守时期农民家庭的抚育模式为隔代留守型照料。为了获得更多的家庭收入，第一代5060后农民工进入全国市场务工，因传统城乡二元体制下，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异地高考政策尚不完善[16]，以及农民家庭经济发展仍然有限，留守儿童进城接受教育的客观条件不成熟，8090后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由祖辈照料，父母的缺位和情感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系列问题[17]。城镇化时期，8090后逐渐步入婚育，在代际合力基础上，他们如愿进入城市生活[18]。高成本城市生活将男性重新拉回生产领域，家庭抚育责任落在了女性肩上，在高密度、高风险的城市社会，年轻媳妇难以兼顾工业生产与抚育子女的双重任务，由此5060后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波大规模进城带孙的“老漂”[19]。以H村为例，虽因为靠近武汉务工方便，全留守的情况较少，但其家庭抚育模式却也经历从农业时期的夫妻放养到城镇化时期的婆媳精细化培优的转变。

（三）新型家庭抚育模式特征

其一，婆媳合作，教养分离。婆婆负责接送和生活照料，年轻媳妇负责学习成绩、品行养成教育，以媳妇为主，婆婆辅助。婆婆文化水平较低和城市生活经历较少，对城市化抚育方式不熟悉，年轻8090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更适合管教小孩，另一方面避免因代际抚育观念差异而引发家庭矛盾。其二，抚育期望高。相比于5060后，8090后大部分接受了中学以上教育，文化水平得到提升[20]，他们普遍希望子女能上大学，跃升为城市中产甚至精英阶层，但与传统农民对子女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抽象期望不同，城镇化时期8090后认为子女能否成功或者优秀不再是“看他自己”、“靠他自觉”，而是通过择校等家庭策略可以实现[21]。其三，抚育成本高。表现为劳动力、货币和精力等资源的密集投入。在城市陌生人社会一个小孩至少需要婆婆和媳妇24小时精心照料，需大量购买早教班、兴趣培训班、兴趣班、私立学校、网络授课等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另外，家长要广泛参与子女学习、情感和生活过程，如辅导作业、建立良好家校关系。其四，抚育方式精细化。表现为抚育日益专业化、理性化。年轻8090后对于如何培养亲子关系、如何辅导子女学业和建构良性的家校关系等，都有一套共享的科学知识体系。围绕培育出优秀的孩子，倾向按照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来有计划、精细地操作自己的抚育行为。家庭抚育主体由传统的夫妻转变为婆媳，家庭抚育和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抚育模式越来越科学化和专业化，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不仅受抚育成本和个体发展的制约，在婆媳代际合力模式下，还要受到婆婆支持的影响，个体压力和代际支持压力机制共同抑制了农村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下文便结合具体的田野案例来分析。

三、个体压力机制：年轻媳妇不想生

（一）家庭再生产压力

城镇化背景下，生育对家庭再生产压力可从抚育开支和经济收入对比来观察。据H村村民反映学龄前期小孩生养花费最少5万，包括生产、奶粉、尿不湿、玩具等花费，不包含当下流行的早教课。而从幼儿园到初中每年至少2万元，上私立学校则为3万～4万元。如果城市里无固定房产，进城陪读每年花费5万～6万元。即使家庭收入无法按照贵族标准投资教育，但培训班、课业辅导班已成家庭教育投资标配。有学者估算城市化抚育0～17岁小孩直接经济成本为27.32万元[22]，实际可能更高。与高昂的抚育开支形成张力的是，刚进城农民家庭收入非常有限。如案例1。

案例1：我在村里当妇女主任，工资1500元左右，加上年终奖，一年大约3万元。老公在中建集团做工程，一个月7000多元。两口子一年收入大约10万元，在父母支持下两人在区里买了一套房子，小孩目前2岁，准备上小学了再搬到城里住。即使在农村与父母一起生活，小家庭的生活各项开支也很大，包括车贷、房贷、人情、保险，加上一家三口的吃穿，一年下来攒不到钱。

如果生二胎，则生活压力巨大，二胎可能买不起保险。（访谈编码：20190819HJN）

可见，刚进城的普通8090后夫妻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小家庭日常生活，“攒不到钱”是较为普遍的状态，再加上房贷、车贷，年轻夫妻家庭再生产的压力较大。另外，二胎的生育不仅会给现下城市生活带来压力，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会影响一孩教育投资水平。典型案例如案例2。

案例2：我在家里做全职主妇，丈夫在广东做药品销售。为了女儿教育考虑两人去年在武汉市区买了一套房子，没二胎的情况下可以给女儿在武汉上1年10万元的高质量的幼儿园，让女儿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和生活，但是如果生二胎的话则现有的家庭收入无法给女儿上这么好的学校了。（访谈编码：20190818HZHQ）

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则可按照城市富裕家庭的标准来培育，实现各项资源最大化投资效应，如果生了二胎，既有经济实力难以保持两个小孩培优投资，影响培优目标实现。与其说年轻媳妇甚至是其丈夫不想生二胎，倒不如说二胎带来的家庭再生产压力使他们不敢生二胎，生二胎甚至是被认为极不理智的行为，经济压力无疑抑制了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

（二）职业发展困境

出生于农村的8090后年轻女性大多接受了中学以上教育[21]，结婚之前大部分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工作，有一份稳定收入和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少部分人也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市场经济中积累了一笔财富。生育直接带来了其就业发展的困境，表现为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工薪水平的降低，如案例3。

案例3：我是保险推销员，业务能力还可以，平时在乡镇和农村生活。女儿14岁，在市里上初三，虽然自己很热爱保险这份工作，但为了女儿上高中，已在市里买了房，打算由全职转为兼职，陪读。虽然自己和父母都想生二胎，但是一想到生二胎就完全不能工作，就不打算生了。（访谈编码：20190825HZHL）

随着一孩进入学龄，自我劳动价值实现困境、职业发展的焦虑感日渐上升。而一孩的养育已经使年轻女性脱离职场至少两年，因文凭不高、技能有限、脱离职场太久，她们择业心态普遍是宁愿工资低一点，职业发展前景差一点，但必须得交通方便以照顾子女。刚性的家庭抚育责任与较低的文化水平、狭小的县域就业空间相互挤压，共同导致了刚进城8090后女性的职业发展结构困境，她们往往很难在本地就业市场上找到比较符合心意的工作，当她们艰难地重返职场后，二胎生育无疑会再次阻碍已有的职业发展。总之，普通家庭的8090后年轻女性很容易因家庭抚育职责而中断自己的职场生涯，这抑制了8090后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

（三）社会交往受阻和生理劳苦

在传统农业社会，年轻女性带着孩子一起干农活、赶集、走亲访友，家庭抚育活动与社会交往活动相互融合，共同嵌入在自成一体的农业生产生活中，不相冲突。年轻女性不仅在乡土熟人社会中有稳定的交往圈，而且在较长的农业赋闲时间里也有充足的交往时间。但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后，经济生产、家庭抚育、社会交往功能不断分化并外溢，家庭逐渐内化为现代私人情感领域。为了抚育子女，8090后年轻女性回归家乡，原工作单位所积累的朋友和同事逐渐不来往，交友聚餐之类的社会活动也比以前少很多。由此带来的生活落差太大，如案例1JN所说：“一结婚生娃，人就没朋友了，以前生活丰富，天天出去吃啊玩啊，现在做什么都要考虑到孩子和家庭。”社会交往生活贫瘠带来的无聊感和无助感在抚育婴儿期间最严重，少部分8090后年轻女性因此产生抑郁。当年轻女性再次返回劳动岗位，重新建构社会交往生活后，二胎生育无疑对女性的身心再次带来极大挑战，这对向往独立自由生活的8090后年轻女性来说较为难受，同时生育还带来了极大的生理疼痛。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年轻女性生育意愿。

四、代际支持的压力机制：婆婆不想带

（一）抚育责任刚性化风险

城镇化时期，老人从农村进城带孙，婆婆由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抚育的辅助角色变成主要责任主体，老人抚育责任不断趋于刚性化。如果婆婆

不带孙子，则必须给儿媳妇一定的物质补偿，带孙子是婆婆的义务。一旦婆婆基于自我养老、身体素质各方面的因素而无法带孙子，则会面临被儿媳和舆论谴责的风险。经典案例如案例4。

案例4：GM，70岁，退休女教师，从60岁开始在市里带孙子到现在70岁。即使自己心里内心想要二胎也不敢说，儿媳也问她生不生二胎，她自己就回答“随你们自己”。因为“万一你说你想要，她生了，你又不给她带，那到时候就是你的不是了，可是我都70岁了，再带一个肯定带不了的。老人家即使心里想要，也不能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了就意味着你必须带了，不然儿媳妇日后就会怪你”。（访谈编码：20190823HGM）

从GM的口述中，不难体会如今老人在面临二胎生育时极其矛盾的心情，既渴望如传统婆婆子孙满堂，但又怕轻言不能履行责任后反被媳妇责难和舆论谴责，所以即使婆婆心里支持媳妇生二胎，往往也不敢轻易说出口。另外，H村带孙子的习俗一般是从出生带到小学毕业近10年，若一个婆婆从55岁算起，带完一个孙子后大部分婆婆都超过了65岁，不论二胎是早出生还是晚出生，大部分婆婆都是无法完全带完两个孙子。抚育责任的刚性化与身体的力不从心让婆婆在是否支持二胎决策上十分犹豫、被动和无奈。

（二）自养财富积累受阻：带孙子与打工赚钱相矛盾

从全国农村养老趋势看，因为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伦理弱化和代际关系离散化，“自养为主，他养为辅”成为当代养老的主要形式[22]。当5060后从正规务工市场退出后，他们的收入大部分在子代彩礼、婚房、婚礼中耗尽，仍需通过零工和务农赚养老钱，这部分工农业生产可让他们老年生活实现经济自由，对精神满足极其重要。在H村男性老人做挖树工，200元～300元/天，女性老人做绿化和花卉，80元～100元/天，两人一年可以赚2万～4万元。而照料孙子与老人赚养老钱是有冲突的。如案例5，案例6。

案例5：L，近60岁，苗木工。我儿子媳妇他们也很为难，他们有家有事顾不过来，老人只要动得了，干得了，就要去干，你难道去要钱？我儿子媳妇在武汉又要租房子，又要供小孩读书，请保姆太贵又请不起，那肯定是我来照顾。找儿子要生活费一两次就烦，他们还恨不得找老人要，当父母就应该要把自己舍出去。（访谈编码：20190819HLML）

案例6：W，56岁，自己带领20多个中老年妇女做苗木，一年挣1万~2万元，儿媳生了孙子后，为了让儿媳工作，自己便不能打工了，但确实又想赚钱养老，也给儿子孙子攒点钱。在与儿媳商量之下，便选择“菜篮子式”打工，即周一到周五带孙子，周末打工。与其情况相似的还有好几个婆婆，都因为要带孙子无法完全打工，只能够周末打工。但“给儿子带孙子比赚钱重要，但打工赚钱是为自己的，大家一起劳动也开心快乐”。（访谈编码：20190821HWAY）

可见，老人打工时限、机会都短暂有限，但这段黄金时间恰又和带孙子的任务周期高度重合，“菜篮子”式打工和城乡间来回往返是老人为了兼顾赚钱养老和带孙子的策略选择。如果只养一个孙子，60岁完成任务后依然可以继续打零工或种田，如果继续带二胎，老人可能完全无法赚钱。另外，在中国农民强烈劳动伦理下，劳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劳动过程还会带来丰沛的社会交往价值，老人们一起劳动是十分快乐的，“手里干着，口里说着，开心啊不得老”！除了带孙子之外，老人有自我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追求，基于对养老资源积累、劳动与交往价值的追求，完成一个小孩的任务后，老人不太支持生二胎。

（三）老年夫妻感情生活牺牲：奶奶带孙，爷爷留守农村

为了支持子代在城市体面生活，老年女性进城带孙，成为老漂，而老年男性留守农村进行农业生产，为子代输送农产品。农民家庭城镇化导致了老年夫妻城乡二元分居，从出生到小学、初中的带孙周期便是老年夫妻城乡分离的时期。如果城乡距离近，还可以周末团聚，而如果城乡距离远，则老两口可能一年见不了几次。但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长期的分离生活对于老人的感情和精神生活是极为不利的。一方面，留守在农村的老年男性独自生产和生活，精神上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碰到生病住院需要照料时，老伴儿一时回不来而子女又要忙于工作，各方面状况会更加糟糕。另一方面，“老漂”在城市生活中也

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23]，从自我实现的角度而言，他们对于城市子女家庭来说是服务者和依附者，难免因生活摩擦而受气，在城市陌生社会里也很难找到聊得来的同伴儿，接送照料孙辈外，她们特别容易陷入无聊、苦闷的消极情绪之中。老年夫妻团聚不仅能够互相照料和扶持，还能够提升老人精神的愉悦与满足感。城镇化背景下，对于是进城养老还是返乡养老，大部分5060后倾向是回村自养，理想的状态是完成带完一个孙子的人生任务后，老两口一起在农村劳作生活[24]。而抚育二胎无疑会延长老年女性在城市的服务时间，加剧老年夫妻分离之苦，影响老人晚年幸福生活的实现。

（四）婆婆抚育地位边缘化

传统农业时期，婆婆作为有经验的长者在抚育上有一定的权威，在媳妇不懂时可以传授自己的经验，婆媳关系在家庭抚育上是相对自然的，在如何抚育小孩的细节上矛盾较少。但城镇化时期，年轻媳妇主导孩童的管教，而婆婆只负责生活的照料，两人在如何家庭抚育上关系十分微妙，如今婆婆或老人在家庭的抚育地位相当边缘化，抚育地位边缘化极大影响了老人是否支持生二胎。一方面，地位边缘化免除了婆婆因管教不力产生的内疚感和负罪感，婆婆只要遵从媳妇的要求，即使孙辈调皮捣蛋和品行出了问题，婆婆也不用自责，也不会被媳妇问责。但另一方面，抚育地位的边缘化带给老人更多的是管教孙辈的束缚感和无力感。老人即使想按照传统方式管教孙辈，但考虑到8090后或多或少接触了现代西方科学抚育理念和知识，对于传统粗放、严厉的抚育方式具有一定的反思性批判，往往只会口头说一说并不会采取过多行动，否则很容易由生活小事直接演化为婆媳矛盾和家庭纷争。最后，在因抚育观念和方式差异带来的婆媳矛盾中，大部分婆婆选择隐忍和退让，这既是传统抚育方式对现代抚育方式的适应，也因年轻媳妇家庭地位上升后[25]，出于家庭和谐考虑，婆婆主动退让。老人不能如传统农业时期自如地参与孙辈抚育，带孙子更像是一项基本任务。婆婆基于抚育地位边缘化和婆媳关系考虑，不会主动支持更多子女的生育。

作为主要的抚育责任主体之一，婆婆不愿带作为代际支持压力，同样也抑制了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一旦农村青年妇女在生育和未来的养育上不能够得到婆婆更多更充分的代际支持，则无疑会在家庭生计、子女抚育和个体发展上出现一系列的危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传统农业时期到城镇化时期，农民家庭抚育模式从农业时期夫妻粗放式养育转型为现代婆媳精细化培优，农民家庭抚育成本越来越高，抚育方式也越来越精细化，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和教养观念在农民家庭城镇化和市民化过程中完成了转型，这无疑抑制了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以H村为例，城镇化时期的家庭抚育模式通过个体压力和代际支持压力机制而抑制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个体压力机制表现为年轻媳妇因家庭再生产压力大、职业发展困境、社会交往受阻和生理劳累而不愿生。而代际压力机制表现为婆婆因抚育责任刚性化风险，带孙子使得自养财富积累受阻、牺牲老年夫妻感情生活和抚育地位边缘化而不愿带。不论主动或被动，在农民家庭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低生育意愿逐渐成为生育文化转型的指针。

这充分反映了农民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有自己的行动逻辑。相比于国家宏观政策所考虑的低人口生育率带来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和社会保障压力，农民家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城市培育出优秀的子女和实现体面的生活。低生育意愿是进城农民家庭生活理性化后自主选择的结果，这种生活理性是对子女培优、年轻夫妻职业与家庭再生产、老年人养老生活全面家庭功能追求下，家庭资源不断博弈、协调、统筹后所达到的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生育的理性化整体上是在代际关系理性化、家庭资源挤压和家庭发展目标扩大化转型中的策略选择。

从政府行为的角度而言，积极的生育政策应考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的发展需求。第一，计生政策应以家庭为单位，实施面向家庭的积极生育政策，不仅应考虑年轻妇女和丈夫，也应适当照顾老年人在城市带孙子的实际需求。第二，生育政策要与相适应的社会政策共同进步，特别是教育政策和养老保障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升公共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比如适当地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并降低门槛要求，缓解当下因激烈的教育竞争带来的教育焦虑和家庭教育负担过重难题。值得提出的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提出要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高优生优育的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并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和合法权益等，这无疑为创造积极的生育环境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参 考 文 献

[1]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2014，38（2）：3-17.

[2] 田葱，王卫杰，李娟，等. 开封市城乡育龄夫妇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9，36（4）：381-384.

[3] 茅倬彦，罗昊. 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J]. 人口研究，2013，37（1）：84-93.

[4] 马良，方行明，雷震，等.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J]. 人口学刊，2016，38（6）：84-93.

[5] 祝吟. 对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2017（15）：26-28.

[6] 柳金凤，王蓉，马薇红. 已育妇女1314例二胎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 宁夏医学杂志，2019，41（3）：242-244.

[7] 肖雯，李姝萌，种宇轩. 全面二胎政策对职业女性“生”与“升”影响[J]. 劳动保障世界，2017（18）：24.

[8] 卢海阳，邱航帆，郑逸芳. 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的视角[J]. 南方人口，2017，32（3）：55-68.

[9] 龙书芹，陈海林. 城市“双非一孩”育龄女性的就业状态对其二胎生育抉择的影响[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3）：83-90，147.

[10] 马良，方行明，雷震，等.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J]. 人口学刊，2016，38（6）：17-26.

[11] 杨菊华. 单独二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试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15（1）：89-96，128.

[12] 杨凡. 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2016（3）：101-108.

[13] 尹银. 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J]. 人口研究，2012，36（6）：100-109.

[14] 李永萍.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2）：44-60.

[15] 费孝通. 生育制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3-61.

[16] 项继权. 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2-11.

[17] 范先佐.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7）：78-84.

[18] 张建雷. 接力式进城：代际支持与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分担机制研究——基于皖东溪水镇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5）：10-20，150.

[19] 陈辉. 老漂：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代际支持的新方式[J]. 中国青年研究，2018（2）：24-29.

[20] 刘传江.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 人口研究，2010，34（2）：34-39，55-56.

[21] 王晓慧，刘燕舞. 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及应对策略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5-80.

[22] 孙敏. 现代家庭的变迁：老人“自主养老”的动力分析——基于上海市近郊村的田野考察[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6）：17-23.

[23] 刘庆. “老漂族”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J]. 西北人口，2012，33（4）：23-26，31.

[24] 黄丽芬. 进城还是返乡？——社会空间与“老漂族”的自我实现[J]. 北京社会科学，2019（11）：4-14.

[25] 王会. 婚姻主导权与中西部农村青年妇女地位考察[J]. 当代青年研究，2020（3）：54-59.

[26] 半月谈. 权威快报三孩生育政策来了[EB/OL].（2021-05-31）[2021-06-20]. http://www.banyuetan.org/szjj/detail/20210531/1000200033135991622451262797044116_1.html

Model of family upbringing: an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rural young women's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YIN Qiuling[1], XIA Zhuzhi[2]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2488,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young women in rural areas is far lower than expected, which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family upbringing model. In some highly urbanized rural areas, the upbringing mode has changed from extensive parenting for husband and wife to intensive parenting for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with higher cost and more sophisticated methods. Under the new parenting model, individual press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ressure inhibit young women's fertility desire. Individual pressure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childbirth will bring difficulties in nuclear family reproduction, female career development,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physical fatigue, resulting in young daughter-in-law do not want to have childre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ressure is that the mother-in-law is unwilling to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because of the risk of rigid care obligation, the obstruction of self-supporting wealth accumulation, the sacrifice of emotional life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family upbringing status. This shows that the farmer family has its own logic in the fertility decision, and the positive fertility policy should take the farmer family as the unit, and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public policies of fertility, upbringing, education, pension and so on.

Keywords: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Family upbringing model; Cooperation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Urbanization

(编辑：程俐萍)